

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商业银行“走出去”的理论与实践

——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

王 勇 顾红杰

(北京大学 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 北京 100871)

摘 要: 新结构经济学是中国社会科学领域自主理论创新的成果。本文运用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研究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中资商业银行“走出去”的背景、模式、原因、挑战以及意义。本文总结梳理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商业银行国际化发展模式与相关主流理论解释,对比后发现,中资商业银行对于境外业务的拓展没有照搬西方发达国家银行“走出去”模式,而是坚持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为前提,结合中国自身与外部不同发展阶段的产业结构与融资需求特点,综合自身发展战略与外部国际环境等各方面因素,不断调整和优化跨境网络结构,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化道路,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目标提供了有力的金融保障。

关键词: 中资商业银行 “走出去”; 跨境网络结构 “一带一路”; 产业升级

中图分类号: F832.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462X(2023)04-0128-10

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和本质要求,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报告还指出,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此外,报告强调了理论创新的重要性,明确指出,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党的理论是来自人民、为了人

民、造福人民的理论,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在众多金融机构中,开展国际化经营的中资商业银行既要扎根国内市场,又要联通国际市场,在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金融桥梁和血脉作用。党的二十大报告为中资商业银行的国际化发展指明了大方向,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对中资商业银行的国际化能力也提出更高要求。回顾中资商业银行的国际化发展历程,率先“走出去”的是中国银行。随后,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等大银行以及招商银行、民生银行等中小银行^①也有序加入,境外网络覆盖范围不断扩大,业务品种日益丰富,即便是在逆全球化形势下,仍表现出强大活力,且跨境网络结构持续调整和优化。面对新形势和新发展目标,运用与中国国情相符的理论视角剖析中资商业银行“走出

^① 本文“大银行”是指中、农、工、建、交五家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其他为中小银行。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形势下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路径与对策研究”(20AJL017)

作者简介:王勇,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学术副院长、长聘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新结构经济学研究联盟秘书长,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顾红杰,中国工商银行总行国际业务部外汇经理,境外机构区域经理,金融管理学博士。作者感谢林毅夫教授在本文写作过程中给予的悉心指导。

去”的特点、动因和形成机制,有助于在把握历史规律的基础上使中资商业银行在国际化道路上行稳致远,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为中国、地区,乃至全球产业升级提供源源不断的高质量金融服务。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运用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研究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中资商业银行“走出去”的背景、模式、原因、挑战以及意义。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是我国社会科学自主理论创新的重要尝试,是由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及其合作者提出并倡导的研究经济发展、转型和运行的理论,并已经在国内外学术和实践领域以及政策界产生了广泛影响。新结构经济学主张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采用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以一个经济体在每一个时点给定、随着时间可变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为切入点,来研究决定其生产力水平的产业和技术以及交易费用的基础设施、制度安排等经济结构及其变迁的决定因素和影响。根据该理论,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应从其自身要素禀赋结构出发,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共同作用下,推动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关于经济发展与金融结构之间的关系,该理论认为金融结构只有和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相匹配,才能有效发挥金融体系的功能,持续促进经济增长(王勇和杨子荣,2018)^[1]。此外,该理论旗帜鲜明地反对生搬硬套以西方发达国家的结构作为暗含结构或最优结构的主流经济学理论,而是提倡“常无”的精神与“一分析、三归纳”的研究方法,倡导社会科学应该重视理论创新与实践紧密结合,互相促进的“知成一体”的新学风。

一、中资商业银行国际化取得的主要成效及面临的主要挑战

(一) 国际化发展速度快且粗具规模

一是大银行经营质效和境外机构数量双提升。境外资产和营收方面,截至2018年末,5家大型国有中资商业银行的境外资产达到12万亿元人民币,贷款余额5万亿元人民币,较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增加了4倍多,远超集团平均增

幅。^①截至2021年末,这5家银行的海外资产规模达到14.78万亿元,较2012年增长了1.7倍;实现境外营业收入3506.3亿元,是2012年全年的2.4倍。根据英国《银行家》杂志2021年“全球1000家大银行”排名,中国银行业有144家上榜,资产总额与一级资本总额占全球1000家银行份额分别达到25.3%和29.8%。机构数量方面,这5家银行从2012年底的1085家增长至2021年的1286家,覆盖6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包括41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本形成了遍布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的金融服务网络(宗良和孙雨心,2022)^[2]。

二是中小银行找准定位,开展特色国际业务。中小银行“走出去”时间普遍晚于大银行,境外机构数量明显少于大银行(见下页表1)。“走出去”的中小银行的区位选择主要集中在新加坡、英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各家银行均在中国香港设有机构,且更加倾向于开展轻资产的中间业务。例如,中信银行除了在英国、澳大利亚、中国香港等地设有分支机构外,通过中信国金、中信银行(国际)、中信国际资产和信银投资等境外子公司积极推进集团联动合作,业务范围除了传统的商业银行业务外,更加突出资产管理、投资银行和私募股权等;民生银行通过其香港分行积极拓展跨境财富管理业务,以网上银行及手机银行为载体,深入挖掘中高端个人客群金融需求。该行年报披露,截至2021年末,该行“跨境理财通”办理资金跨境汇划金额市场份额占比23.49%,其中“南向通”市场份额尤为明显,资金往来发生额占比39.29%,净流入香港金额占比47.15%。

(二) 践行全球和国家发展战略成效瞩目

一是为全球绿色可持续发展提供高质量金融服务。2021年,中行、工行、建行和农行再次入选全球系统性重要银行,成为全球经济金融的稳定力量,积极响应和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理念,加大绿色和可持续发展投资力度,推进全球经济高质量发展。二是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支持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能源资源开发、国际产能合作、境

^① 根据各家银行公开披露数据整理。

外合作园区等重大项目。截至 2021 年末,中行、工行和建行在“一带一路”地区累计支持项目逾 1300 个,累计提供授信逾 3500 亿美元。三是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灵活运用境内外市场差异,为客户提供一揽子金融服务方案。积极推动人民币在项目融资、金融市场以及清算服务领域的运用。

2021 年,中国银行业办理跨境人民币结算量达到 13.74 万亿元。迈入“十四五”时期,以新发展格局引领高质量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加强 RCEP 框架下双边和多边合作、持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等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和推进,都离不开中资商业银行高效的金融服务网络 and 高质量金融服务。

表 1 截至 2021 年末主要中资商业银行的境外网络拓展情况

银行分类	名称	资产规模 (单位:万亿元 人民币)	净利润 (单位:百亿元 人民币)	国际化起点 (年份)	境外机构数量	覆盖国家或 地区数量
国有大型 商业银行	工商银行	35.17	35.02	1992	421	69
	中国银行	26.72	21.66	1929	550	62
	建设银行	30.25	30.39	1991	200	31
	农业银行	29.07	24.12	1993	17	15
	交通银行	11.67	8.76	1934	92	18
股份制 商业银行	招商银行	9.25	12.08	1992	9	6
	中信银行	8.04	5.63	2019	7	4
	民生银行	6.95	3.49	2004	1	1
	浦发银行	8.14	5.38	2011	4	3
	光大银行	5.9	4.36	2000	7	5
	广发银行	3.36	1.75	1993	2	2
	兴业银行	8.60	8.38	2014	1	1
	华夏银行	3.68	2.39	2015	1	1
	平安银行	4.92	3.63	2012	1	1

数据来源:根据各家银行年报和公开披露信息整理。截至目前,各家银行 2022 年相关信息尚未对外发布

(三) 当前中资商业银行“走出去”面临的主要挑战

1. 面临法律、文化、制度等方面的挑战

中资商业银行“走出去”目标国的历史沿革、政治体制、社会结构、经济发展、文化背景和宗教民俗等差异大,给中资商业银行本土化经营带来巨大挑战。譬如,各国法律体系不同,波兰和越南等国属于大陆法系,新加坡和印度等国属于海洋法系,而阿富汗和伊朗属于伊斯兰法系。此外,还有一些国家同时兼具以上法系特点。即使在相同的法系框架内,各国立法也有差异,法律体系之间缺乏兼容性,导致各国联合打击跨境金融犯罪难度

大,难以构建区域性信用体系。

2. 国际监管趋严使中资商业银行“走出去”面临巨大压力

在由英国、美国、日本和欧盟国家主导的银行国际化发展阶段,商业银行“走出去”面临的跨境监管障碍较小,特别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这些国家在境外开设机构几乎没有准入门槛。而当中资商业银行开始加快“走出去”时,国际监管环境已经发生巨大变化。跨国银行的扩张和海外资产的急剧膨胀引发跨国银行资本风险。1974 年,联邦德国赫斯塔特银行和美国富兰克林国民银行相继宣告破产,使得各监管机构开始重新审视拥有

广泛国际业务的银行监管问题。应新形势需要,《巴塞尔协议 I》于 20 世纪 80 年代发布,逐步升级完善至 2019 年发布的《巴塞尔协议 III》。《巴塞尔协议》在新增宏观审慎监管的同时,在微观层面对银行的总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和资本留存率最低指标等均提出更高要求。

3. 面临当前全球发展不平衡、政治不稳定、新冠疫情冲击等各种严重挑战

近年来,俄乌冲突引发全球能源和金融市场动荡;拉美国家经济环境脆弱,国际金融市场波动触发汇率风险;东南亚部分国家常年受选举影响而导致政局不稳;中亚地区民族和宗教冲突错综复杂;围绕石油问题展开的美伊矛盾导致中东地区常年处于紧张状态;非洲部分国家政局持续动荡。地缘政治的不稳定影响全球对外投资的持续发展。此外,2020 年初开始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的蔓延,也使得商业银行跨国经营面临空前挑战。

4. 中资商业银行面临的特有挑战

一是面临日益严峻的地缘政治形势。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美贸易摩擦加剧、两国的技术与人才交流受到遏制、产业链面临脱钩风险、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屡屡受到各种新限制等等,使得中资商业银行在“走出去”过程中面临日益严峻的地缘政治形势与外部压力。二是面临国际化任务重与全球服务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截至目前,相对发达国家的国际化银行,中资商业银行在业务结构、客户结构、产品结构等方面尚存短板,综合化银行功能不足,导致在与外资同业竞争国际跨国公司业务时缺乏竞争力。此外,总体而言,中资商业银行金融市场的参与度较低,重大项目评估审贷能力有待提升,在与外资同业竞争时处于不利地位。

二、现有西方主流银行国际化理论的主要观点与局限性

(一) 代表性的当代主流银行国际化理论

主流银行国际化理论主要发展自国际贸易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且主要关注银行的国际化动因,即银行为什么“走出去”。最有代表性的有比

较优势理论、区位优势理论、追随客户理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规避风险假说等^[3]。1976 年,罗伯特·阿尔伯(Robert Aliber)提出比较优势理论。根据该理论,各国银行进行国际化发展主要基于比较优势。因银行比较优势有差异,导致不同国家银行之间的存款和贷款利率存在较大差异,从而引发各国银行逐步开展国际化。20 世纪 80 年代初,哈波特·格鲁拜尔(Herbert G. Grubel)基于比较优势理论提出区位优势理论。根据该理论,银行国际化投资所在的东道国具有独特优势,特别是在管理体制、市场存贷款利差和税收政策等方面给予外资银行的各种优惠,或是因为东道国相比母国在经营环境方面具有优势,例如税收优惠、市场容量和监管环境等。1984 年,罗伯特·阿尔伯(Robert Aliber)提出追随客户理论。根据该理论,银行跨境经营的目的是巩固客户资源,为其跨国经营的客户提供跨境银行服务。跨国银行的主要发展动机是配合国际贸易进行的。在主要的贸易伙伴国设立银行分支机构可以便利贸易结算和支付,一方面可以提升母国出口商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可使银行获取稳定的中介收入(陈天,2007)^[4]。1989 年,邓宁(John Harry Dunning)提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根据该理论,银行开展国际化经营是基于在所有权、内部化和区位方面的优势。所有权优势即竞争优势,是指跨国银行拥有东道国银行不具备的管理经验、营销手段和创新力等竞争优势;内部化优势是指跨国经营的银行将其拥有的资产加以内部使用而为自己带来竞争优势;区位优势是指跨国经营的银行运用境外网络和东道国良好的经营环境提升自身竞争力(邓宁,2016)^[5]。1995 年,赫斯顿等人(Heston et al.)提出规避风险假说。根据该假说,鉴于资产组合中不同资产的收益率变动不完全呈正相关,资产多样化有助于降低和分散投资风险,将银行资产分布在不同国家可以有效规避国别风险,提升投资收益的稳定性。

(二) 西方主流银行国际化理论运用于分析中资商业银行国际化现象的局限性

西方国家提出的银行国际化理论多是 20 世纪从银行国际化实践中提炼出的规律,这些理论

在解释中资商业银行国际化现象时显现出不适用性。一是忽视了银行国际化与该国产业结构内生性特点与经济发展目标之间的关联性。西方银行理论更多是从金融服务供给端,即银行的利益最大化需要考虑银行为何选择“走出去”,忽略了需求端在不同发展阶段经济发展目标对银行国际化经营效率的要求。二是对地缘政治和国际环境的关注较少。受时代背景影响,这些理论更多关注贸易壁垒和各国之间的税收等差异对银行国际化经营的影响,对地缘政治及国际环境变化产生的相关影响关注较少。三是缺乏对不同发展阶段下银行国际化难度的区分。对于英国、美国、日本、欧盟国家的银行,其国际化初期阶段“走出去”多是发生在发展程度上“自上而下”或是水平相当的经济体之间,且母国和驻在国的文化、制度等较为接近。而中资商业银行“走出去”的目标国经济发展水平各异且文化、制度差异大,情况更复杂。四是缺乏对“走出去”结构的关注。这些理论多是20世纪西方国家提出的,彼时,跨境经营的准入门槛低且国际监管环境相对宽松,因此,银行“走出去”的“动因”比“跨境结构”更受关注。

三、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产业升级与商业银行国际化的关联

本文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出发,关注银行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发展关联,以及政府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在分析归纳中资商业银行与其他国家银行跨境经营共性的基础上剖析其特点和成因。在分析方法上,本文运用新结构经济学所提倡的“一分析、三归纳”分析法。“一分析”即面对一个现象时,不能仅从已有的理论出发来解释这个现象,而是要了解这个现象背后的主要决策者、要实现的目标,以及有哪些可供选择的方案,分析这些方案的相对成本和收益,并在此基础上得出能更好地实现目标的最佳方案。由于经济分析涉及很多环节和变量,需要对其进行有效归纳。第一种方法是当代横向归纳法,即在同一个时代中做横向比较,归纳某种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第二种方法是历史纵向归纳法,即研究经济现象既要关心当下,也要了解历史,

要进行纵向比较;第三种方法是多现象综合归纳法。一个因会导致果,而这个果则可能成为其他现象的因;一个理论要想达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目的,则需要明确这些现象背后的根本原因^[6]。

具体到分析中资商业银行的国际化问题时,我们应该将中资商业银行的国际化置于全球产业升级和银行国际化发展历史中进行纵向归纳,再结合国情和发展阶段,对不同银行的国际化发展进行横向归纳,提炼出银行国际化发展的规律和一般性,并在此基础上,就一些复杂现象,即中资商业银行国际化的特点进行综合分析,得出这些特点背后的深层原因。

回顾历史,全球范围内几次大规模的产业升级带动了全球银行业的国际化大发展,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产业升级可以促进银行国际化发展,同时,有竞争力的国际化银行可以提升产业升级的效率。前几次产业升级过程中,主导产业升级的英国、美国、日本和欧盟国家主导了同时期的银行国际化大发展,并且奠定了全球银行国际化格局的基础。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中资商业银行加速“走出去”,填补了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在全球银行国际化格局中的空白。全球产业升级史也刻画出了全球银行国际化发展史。本文根据产业升级的规模和影响力等,将全球范围的产业升级大致划分为六个阶段。此外,从银行国际化带动产业升级的视角,将全球范围的银行国际化发展大致划分为六个阶段,分别是由英国、美国、日本、欧盟国家主导下的发展阶段,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资商业银行“逆流而上”的国际化发展阶段。进一步地,本文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通过“一分析、三归纳”分析法中的“历史纵向归纳”和“当代横向归纳”,分析历次产业升级与银行国际化发展之间的关联,以及同一国际化发展阶段下,不同国家的银行国际化表现,从而提炼出商业银行国际化的一般性,以及中资商业银行有别于外资同业国际化的特殊性。

第一次产业升级始于18世纪中叶。其间,英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加快在殖民地的贸易出口。据统计,除了呢绒以外的制造业产品,英国对其殖

民地的出口增幅曾一度超过 200%。美国是此次产业转移的最大承接者和受益者。同时期,英国主导了全球银行国际化的第一次大发展。英国的银行通过向殖民地和附属国发放贷款,对其分布在各殖民地的贸易往来提供融资支持。自 19 世纪 30 年代,英国在加勒比海、北美殖民地开设分支机构,逐步将境外网络拓展至拉美、英属印度、中东和欧洲国家。19 世纪 70 年代以后,法国、联邦德国等国家的国际化银行也较为活跃,至 20 世纪初,已经粗具规模。

第二次产业升级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其间,美国将钢铁、纺织等传统产业输入日本和联邦德国,集中发展半导体、通讯、电子计算机等技术密集型产业。同时期,美国主导了全球银行国际化的第二次大发展。其间,银行“走出去”主要是在发达经济体之间。1965—1985 年间,设立在比利时、法国和联邦德国的美国银行分支机构数量分别占总量的 29.6%、26.4% 和 31.1%。同时期,美国国际化银行的境外总资产大约有 54%~78% 分布在比利时、英国、法国、日本等 11 个发达国家,其中有 36%~59% 分布在英国^[7]。美国银行业在二战后的大发展为其今后长时期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占据领先地位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三次产业升级始于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其间,日本和联邦德国在劳动力成本方面不再具有比较优势,其为了降低劳动力成本,转移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集中发展钢铁、汽车、航天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同时,通过直接投资方式将资本和先进技术转移给亚洲四小龙等新兴市场。20 世纪 70 年代,日本和联邦德国的钢铁、造船、汽车、家电等重工业产能过剩,而亚洲四小龙经过 20 世纪 60 年代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开始承接日本和联邦德国的部分重工业,日本和联邦德国开始进入微电子和新能源等附加值更高的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时代。同时期,日本和联邦德国主导了全球银行国际化的第三次大发展。伴随着日本、以联邦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加速将钢铁、造船、汽车等产业转移至亚洲四小龙等新兴市场,这些经济体的银行国际化步伐也随之加快。特别是“广场协议”签订后,日元大幅升值,日资企业加大对外投资力度,日

资银行不断拓展境外网络,以增强服务“走出去”客户的能力。1978 年,按照资产排名的 100 家最大的跨国银行中,日本占 23 家,位居世界首位,超过了占 14 家的美国。1966 年,日本海外银行分支机构不到 100 家,发展到 70 年代中期达到近 200 家,到 80 年代初期已超过 500 家。同时期,联邦德国等欧洲国家的海外网络拓展也开始加速,从 60 年代中期的 15 家发展到 80 年代初的 75 家,覆盖 34 个国家和地区,银行的海外业务量从 1973 年到 1977 年增加了 3.3 倍,其中银行海外机构的业务量增加了 7.7 倍。

第四次产业升级始于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此次产业转移的输出国(地区)既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主要有美国、日本、亚洲四小龙等。中国是此次产业转移的最主要承接者和受益者,吸引了大量国际投资,推动了内地制造业的大发展,逐渐发展成为“世界工厂”,并成为世界经济增长中心。同时期,美国和欧盟国家的银行国际化发展最为突出。这一时期发生了一系列金融危机,其中破坏力最大的是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导致大量日本银行倒闭,日本银行的国际化影响力整体下降。同时,金融危机导致很多转型国家放宽了对外资银行的准入门槛,推动了美国和欧盟国家等发达经济体银行国际化的新一轮发展。同时期,中国实施了改革开放政策,伴随着大量中资企业走出国门,除中行外,其他大型国有商业银行也开始加速在境外布局经营网络。20 世纪 90 年代初,中国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和农业银行均在境外开设了第一家分支机构。

第五次产业升级始于 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后。这期间,发达国家开始陆续回归制造业。波士顿咨询集团 2011 年的调查报告显示,有近一半总部设立在美国、收入超过 100 亿美元的跨国公司有意愿回流美国。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银行业受到重创。中资商业银行抓住市场机遇,自主申设和战略并购并举,加快境外网络布局,弥补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银行国际化格局中的空白。中行在金融危机后加快全球布局并推进境外业务转型,2011 年海外商业银行客户存贷款分别同比增长 26.12% 和

32.36%。工行 2008 年境外资产同比增长约 15%。同年 3 月,完成对标准银行 20% 股权的收购。工银印尼在并购后第一个完整年度(2008 年)盈利增长 201 万美元。^①此外,建行、交行和招行等也加速国际化步伐,在境外机构网络和业务拓展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效。

第六次产业升级始于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随着劳动力成本的持续上升,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逐渐失去比较优势,而一些“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的劳动力成本比中国更低,在中国的这些“转进型”产业上具有潜在比较优势,但是落后的基础设施等因素制约着它们的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还有一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能源、农业等产业上具有比较优势。总体而言,很多“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的产业结构与中国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如下页表 2 所示,“一带一路”沿线的 53 个国家中,有 41 个国家与中国的贸易互补性指数^②大于 0.5,整体互补性强。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上指出:“要更好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要统筹考虑和谋划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共建‘一带一路’,聚焦新发力点,塑造新结合点。要加快完善各具特色、互为补充、畅通安全的路上通道,优化海上布局,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提供有力保障。”^[8]中资商业银行积极响应国家战略,结合各自业务特点和比较优势,整体加大了在“一带一路”沿线的业务投入力度。

第六次产业升级期间,中资商业银行逆流而上。截至 2019 年末,建行和农行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新设境外机构数量占到其全部境外机构数量的一半以上。中资商业银行综合金融服务能力全面提升,并加快金融产品创新,除了传统的结算、清算、贸易融资、项目贷款外,跨境人民币、全球现金管理、投资银行、移动支付、托管等业务得到快速发展,全球一体化服务能力不断增强。根据 2013 年英国《银行家》杂志发布的全球前 20 家大银行排名,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和中国银行分别位列第 1、第 9、第 11 和第 14 名,这 4 家银行的总资产达 91319.56 亿美元,占前 20 家银行总资产的 21.1%。除了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

家外,发展中国家中只有中国的银行排入前 20 名。通过创新金融合作模式,中国开始在区域和全球合作中发挥更加积极和重要的作用。2017 年,在人民银行支持下,工商银行发起成立“一带一路”银行间合作机制(简称“BRBR 机制”)。截至目前,该机制拥有上百个成员,成员类别有国际双边和多边金融机构、中资政策性银行、中资商业银行、外资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等。各成员机构借助该合作平台,发挥各自比较优势,积极助力“一带一路”建设。

下页表 3 对银行业国际化发展的以上六个阶段的主要特点和监管环境做了归纳。

四、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中资商业银行跨境“走出去”特点及形成机制

根据“一分析、三归纳”分析法中的“多现象综合归纳法”,对同一经济体同时存在的复杂现象进行综合分析,最有可能找到背后真正的影响因素,是对“当代横向归纳法”和“历史纵向归纳法”的补充。结合这三个维度的归纳,有助于决策者在有限的条件下,面对复杂环境和现象找到背后的决定因素,从而做出理性判断。

中资商业银行国际化发展过程中也同样出现了一些有别于其他外资同业的复杂现象,如果不进行深入综合分析,则难以找到背后的真正影响因素,从而影响决策者正确判断并调整中资商业银行的跨境网络结构。从本文第三部分归纳分析可见,作为全球银行国际化发展过程中的一部分,中资商业银行的国际化具有和英国、美国、日本和欧盟国家银行国际化的共性,即在历次产业升级过程中,各国商业银行是产业升级的重要金融支持力量,产业升级的主导国带动了同时期全球银行国际化的大发展。但同时,中资商业银行“走出去”也有自身特点,这些特点正是有别于外资同业国际化的复杂现象,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① 根据银行年报及公开披露信息整理。

② 贸易互补指数衡量两国之间进出口的兼容性,该指数在 0 和 1 之间,指数越大代表两国之间贸易互补性越强,具体参见孙立行、沈玉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投资报告》,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9 年版。

(一) 呈“渐进式”态势,且大银行是主力

中资商业银行“走出去”是“渐进式”的,且大银行是主要力量。在英国、美国、日本和欧盟国家主导的银行国际化大发展中,在国际化发展的初期阶段,小银行是服务企业“走出去”的主要金融力量,且政府并未将资产规模视为把关银行“走出去”的重要条件。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看,这一“走出去”特点是中国产业结构内生性特点和外部经营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

内部产业结构方面,新中国成立之初,确立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制造业的发展战略,并配套成立了大型国有商业银行,以高效地服务于经济建设。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大型国有商业银行伴随着中国的钢铁、建筑、运输、矿产等相关企业走出国门,不断完善经营网络和产品,逐步从中行“一枝独秀”发展为以中行和工行为主导的“两超多强”的国际化发展格局。进入“一带一路”倡议和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建设战略提出后的发展阶段,中国充分发挥全产业链优势与“一带一路”国家之间的贸易互补机遇,带动中资商业银行国际化发展迈上新台阶。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加大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协助沿线国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突破其经济发展瓶颈。因这些基础设施项目需要的资金规模大,大银行在资

产配置效率方面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是“一带一路”项目融资支持的主要力量;在大湾区,香港和澳门已经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第三产业的比重超过了九成。香港的金融、保险、进出口贸易等行业具有明显禀赋优势。中小商业银行积极发挥在金融科技创新方面的积极性和比较优势,拓展轻资产的中间业务。

外部环境方面,中资商业银行国际化起步晚且“走出去”的目标国经济发展程度差异大,遇到的监管障碍、跨文化挑战和地缘政治风险等明显大于前几波国际化大发展时期。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沿线国家的政治稳定性和政府能力、经济和金融实力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地缘政治风险处于较高水平(见图1)。面对外部经营挑战,相比中小银行,大银行在统筹效率、人才培养、合规建设、清算系统等各方面都更有竞争优势。同时,为更好地应对跨境经营挑战,金融监管牵头促进金融机构完善跨境合作模式,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如前文提到的“BRBR”机制的成立。在大湾区,因该地区文化、法律和制度等障碍明显小于国外市场,除了大银行外,中小银行同样具备拓展业务的条件。中国香港是小银行“走出去”的首选地,且更偏好资产管理、投资银行、私募股权和数字经济方面的业务。

表 2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互补指数

国 家	CI	国 家	CI	国 家	CI
文莱	0.965	新加坡	0.877	约旦	0.491
蒙古	0.958	斯洛伐克	0.875	缅甸	0.467
卡塔尔	0.957	匈牙利	0.873	摩尔多瓦	0.361
柬埔寨	0.954	巴基斯坦	0.867	巴林	0.344
印度尼西亚	0.938	土耳其	0.836	沙特阿拉伯	0.310
俄罗斯	0.931	捷克	0.832	黎巴嫩	0.189
白俄罗斯	0.918	保加利亚	0.830	阿联酋	0.178
乌兹别克斯坦	0.913	爱沙尼亚	0.822	格鲁吉亚	0.146
黑山	0.892	菲律宾	0.815	马尔代夫	0.143
埃及	0.891	波兰	0.809	科威特	0.133
哈萨克斯坦	0.889	斯洛文尼亚	0.801	阿尔巴尼亚	0.010
亚美尼亚	0.887	泰国	0.798	—	—
乌克兰	0.882	以色列	0.788	—	—
拉脱维亚	0.880	马来西亚	0.780	—	—

注:数据取自世界贸易组织数据库,部分国家因数据可得性原因没有列入

表 3

历次银行国际化发展的主要特点和监管环境比较

国际化发展阶段	主导国家	区位选择	市场和政府的作用	监管环境
第一阶段 殖民主义时期	英国	殖民地国家	市场驱动	无门槛
第二阶段 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	美国	发达市场	市场驱动	低门槛
第三阶段 始于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	日本、联邦德国	发达市场	市场驱动	低门槛
第四阶段 始于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	美国、欧盟国家	新兴市场	市场驱动	BaselI 和 BaselII 相继发布
第五阶段 2008 年金融危机后	中国	发展程度不同的经济体	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	BaselIII 出台,监管限制和压力空前加大
第六阶段“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				

信息来源:作者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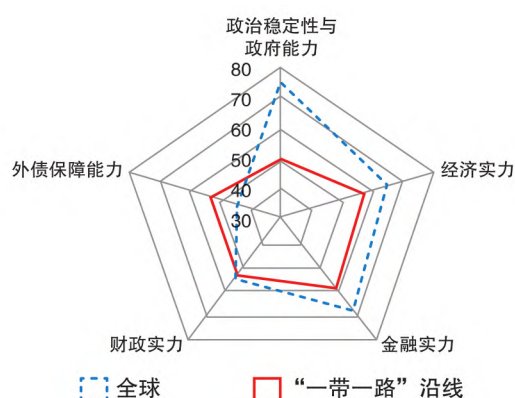


图 1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全球主权信用风险特征比较

来源:《2020 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权信用风险展望》,东方金诚制作

由此可见,影响中资商业银行跨境网络特点的根本因素是中国产业结构的变化,同时受外部经营环境影响。中资商业银行“走出去”是为了服务实体经济发展,而西方国家理论提到的银行国际化动因,即追随客户“走出去”和追求利润最大化等,只是中资商业银行“走出去”的部分现象。

(二) 更有规划性和战略性

根据新结构经济学,金融结构应该随着经济发展目标变化而持续调整,在此过程中,政府应发挥积极作用。中资商业银行的跨境网络结构的形成过程可追溯至历次“五年规划”(计划)。例如,20 世纪 70 年代中国实施的“五五计划(1976—1980)”确定了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为中资商业银行“走出去”创造了开放的市场环

境。“十五计划(2001—2005)”确定了“走出去”战略。自 2003 年开始,中国大型国有商业银行陆续股改上市,增强了国际化发展的资金实力。“十三五规划(2016—2020)”提出要健全商业性银行、政策性银行、合作性金融分工合理、相互补充的金融体系。其间,中资商业银行“走出去”形成中行和工行引领下的“两超多强”的跨境网络结构。“十四五规划(2021—2025)”明确指出,要加快金融等生产型服务业的国际化发展。在政策指引下,“走出去”的商业银行通过发行绿色债券,加大绿色金融投放力度,积极响应并参与高质量发展,践行绿色低碳发展理念。

(三) 中国政府注重跨境网络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在英国、美国、日本和欧盟国家主导的前几次银行国际化大发展过程中,银行“走出去”更多是一种追求利润和市场驱动下的选择,虽然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发挥了必不可少的金融支持作用,但是,因政府对银行跨境网络结构的关注较少,且过度“市场化”,导致银行破产倒闭现象频发,代价惨重。例如,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部分欧洲国家和日本的银行业国际化发展迅速,跨国银行的海外扩张和海外资产的快速膨胀,叠加“过度”追求产品创新,导致金融风险集聚,跨国银行破产频发。例如,1974 年,联邦德国赫斯塔特银行和美国富兰克林国民银行相继破产。再如,20 世纪 80 年代初,美洲银行的国际化程度曾一度高达 50% 以上,在欧洲和拉美地区设立了大量经营机构。

但因对欠发达市场发放了过多信贷导致业务结构失衡,一度陷入严重亏损。经过不良资产剥离和一系列产品线出售等战略调整,该行国际化程度降至10%左右。

相比之下,中资商业银行的跨境经营显现出后发优势,在汲取了全球前几个阶段的银行国际化发展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更加注重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使命担当,不断提升效率。具体体现在,一是将服务国家战略置于首位,兼顾好经营效益和风险控制。避免生硬照搬西方银行的国际化发展模式而枉交“学费”。二是发挥好国内客户资源和人民币国际化等方面的比较优势,持续提升具有自身特色的国际化路径和发展模式。三是深入研究并严格遵守国际监管规则,提升深度融入国际市场的能力。

2021年,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上作主旨演讲时曾指出,根据世界银行报告,到2030年,共建“一带一路”有望帮助全球760万人摆脱极端贫困,帮助3200万人摆脱中度贫困。我们将本着开放包容精神,同愿意参与的各相关方共同努力,把“一带一路”建设成为“减贫之路”、“增长之路”,为人类走向共同繁荣作出积极贡献。在统筹规划下,中资商业银行“走出去”是为了更高效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和惠民生,而非单纯追求利润最大化。

五、结语

本文运用新结构经济学视角论证中资商业银行“走出去”是为了服务实体经济的发展和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为了持续推进产业升级,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中国政府需要发挥积极的因势利导作用。在中资商业银行的国际化发展

过程中,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缺一不可。在实践中,中国没有照搬其他国家银行国际化的发展模式,而是批准中资商业银行“渐进式”走出国门,且优先选择大银行“走出去”,鼓励其他银行根据自身竞争优势开展特色业务,并支持金融机构之间加强合作。这一发展模式和跨境网络结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理性选择,对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展望未来,进一步优化中资商业银行的跨境网络结构和国际化发展路径,对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促进区域乃至全球经济稳定发展,以及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富裕等惠民生的战略目标均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 [1] 王勇、杨子荣《新结构金融学理论与应用》,《金融博览》2018年第5期。
- [2] 宗良、孙雨心《新时代中国银行业全球化的历史跨越》,《中国金融》2022年第13期。
- [3] 夏友仁《中资商业银行国际化经营的理论基础综述》,《财政金融》2016年第11期,第173页。
- [4] 陈天《“追随客户理论”对我国商业银行跨国经营的启示》,《理论探讨》2007年第7期,第25页。
- [5] 约翰·邓宁、萨琳安娜·伦丹《跨国公司与全球经济》,马述忠、曹信生、柴宇曦、许光建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85页。
- [6] 林毅夫《本体与常无:经济学方法论对话》,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7页。
- [7] 李杰、满新程《商业银行“走出去”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8页。
- [8]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497页。

[责任编辑:房宏琳]